



聚焦基层真问题 别让调研成调演

□ 清和(基层公务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我深知调查研究对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此深感支持。不过,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也发现,要在调研工作中察民情、发民声、解民困,发现真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要让基层调研充分发挥效用,避免沦为形式,必须克服容易出现几个问题。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之一,就是某些单位对上级调研存在主观敬畏、客观逃避的心态。在上级部门对基层开展调研时,形式上偏向于先发函,确定基本的行程方案,调研一般

都由县市区领导陪同。从心理上讲,基层治理成效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政绩,基层更希望上级部门看到的肯定是成绩而非问题,就算提出问题,也偏向于依靠提出问题,取得上级在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

就当前很热门的项目推进调研而言,走访调查的点位一般会由县市区两办和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对接,安排有亮点成效、有代表性的点位。在省级部门调研,精简文会落实情况时,存在会多、文多问题的基层单位也很少透露真实情况,而是会报送被人精心筛选过的会议台账,通过台账上的精简文会,为调研工作呈现理想结果。

与此同时,防止作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也很重要。一般来说,上级部门调研一个县(市、区)通常会花一到两天时间,就算一直调研走访,时间安排上也比较

紧张。普通群众特别是年纪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对于调研内容的知情程度比较有限,单纯靠座谈等方式,很难让调研者全面知晓实际情况。特别是在社区、村这一层级上,社区干部、村干部很容易透过熟人网络影响调研结果,让调研无法听到实情的情况增多。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上级部门在调研时或多或少存在“只把脉,不开方”的问题,把调研发现的问题都交由基层自行整改。基层说是要层层压实责任,但具体的处理方式,又可能是将问题层层下放,基层工作很多时候都要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对各种层层下放的上级要求自然疲于应付,这就容易导致“空整改、假整改”。以我接触过的工作中举例来说,在日常问题整改的台账准备中,县(市、区)两

办会进行问题任务分解,明确给下级单位列出要报送的问题数量,部门乡镇会对照自己能完成的工作认领、补充台账。这时,考虑到调研之后的问题整改是否做到,基层单位很可能故意点出一些无关痛痒、容易解决的老问题、小问题,使问题整改成为“新瓶装旧酒”。

针对上述问题,调查研究应当明确导向,确保从调研方案制定、调研人员确定、问题整改督促等方面通盘考虑,形成问题整改的闭环。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就是整顿某些干部的逃避卸责倾向,坚持问题导向,真正实现党政机关想调研、愿调研、敢调研。上级部门在基层开展调研时,要做到不怕揭短伤和气、不怕细究得罪人,基层单位也要直面问题敢接手,分析问题真解决,实现“基层寻医问药,上

级把脉会诊,基层讲述病症,上级开方配药”的效果。

其次,基层调研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尽力避免调研成为“调演”。尽可能多在调研中安排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环节,就是有效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调研者也可以结合实际,由上级部门、县市区、村社、专家等人员组成长期从事“观察点”式调研的小组,全面、细致掌握工作情况,避免调研结果被人“安排”。

最后,在调研问题整改的过程中,调研部门一定要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时效性问题立行立改、长期性问题定期回访、复杂性问题的“联合会诊”,探索形成多方合作整改的机制。上级部门出指导意见、基层部门提落实举措、问题来源提实际诉求,这样的闭环式工作结构,有助于推进问题整改到位。总而言之,党政机关在调研中提高工作本领,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握民意、赢得民心。

调查研究要

先做学生后做先生

□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调查研究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青年干部提出的“七种能力”中的重要一项。可以说,政治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等其他六种能力,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能力的强大支撑。

调查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唯上,指的是不机械而僵硬地,而是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具体地、因地制宜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策,也即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这种创造性执行能力的底气 and 前提,正来自扎实的调查研究。不唯书,不是反对读书,而是反对那种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的“本本主义”。只唯实,就是要把党的创新理论同鲜活实践密切联系、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当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时,往往需要多角度的解释。今人的普遍问题是间接经验发达,直接经验欠缺,就是说书本知识学了不少,但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和许多生产生活方面的经验,未见得比我们的上一辈人更多。为了防范枯坐书斋所形成的理性僭越与独断,防止得一孔之见强加于人,必须尊重现实的多样性,必须在理论与现实的往返中,明晰问题意识,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最终能够达到的认识水平。

其一,调查研究的基础从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事情当中发现可追问之处,并提炼其内在逻辑、运作机理。比如,一个人至少可以从认识自己的父母、家庭开始,了解其生计来源、亲缘结构、代际关系,继而扩展到社区内的邻里关系、单位制中的工作关系等等。从生活开始、从身边留意、从小处着手,这是学会调查最便捷的路径。

其二,调查研究需要以人为本,需要对人的发展有非常深刻的敏感。我们调查和交往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不是自动应答的机器,不会主动袒露心扉。所以要深刻地融入被访谈对象自身的发展历史中,而不是冷漠地做一个旁观者。要设身处地站在被调查者的角度,还原历史的场景,甚至跟他一起算细账。

其三,调查研究要注重理论(模型)、数据(事实)、政策(脉络)、历史(路径)、经验(个案)的五位一体。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这5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当理论遭遇事实的否定时,有两种选择,一是老老实实地认输、放弃并寻求新的解释,二是探究条件和边界的特异性问题。那么,后者就是在理论内部提问题了,这也是一种提问方式,何以可能的追问丧失意义后,还可以追问何以不可能。对于个人的隐而不宣的动机,只能借助于此,将好奇心同时带着问题意识而不跑偏地去唠嗑儿,才能尽量接近这个目标。一些看似经济现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更多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因素,就更需要解好这个“多元联立”的方程组。

其四,调查研究要敢于开口,善于概括,勤于动笔。调查是对人的交往、表达、概括、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刚开始时,要跟随着经验的调查者,多听、多记、多观察。积累一定经验后,就要学会独立开展工作。要敢于和陌生人讲话,敢于超越同龄人阶段、和不同年龄段的人沟通交流,自然而平滑地进入调研访谈状态。在对话过程中还可以逐渐一心多用,留心听取对方的回答、及时抓住亮点展开追问、随时注意是否跑偏以便拉回。每次调研结束,要用笔记的方式复原过程,并记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其五,调查研究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逐步实现双方都从中受益。一个初作调查的人,是给别人添麻烦的,是让别人耽误时间来提供对调查者有益的资料、数据、经验的。但经历过多次这种调查,对他人的生活阅历有了深刻理解之后,调查者也可以在访谈过程中设身处地地提出对被调查者有所启发和助益的建议,这个时候,调研过程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积极的、双赢的愉悦体验了。

当下为何要强调大兴调查研究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遵循科学方法程序 方能获取真实民意

□ 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调查研究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手段。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想要了解民众需求,参考真实民意制订有效政策,都离不开高水平的调查研究。不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程序,真实、全面了解调研对象,形成总体看法,由此设计和制定包括政策供给在内的社会干预方案,达成有效社会治理。

对有关部门而言,要在调查研究中获取尽可能真实、全面的民意,必须在科学方法和程序上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是测量的有效性原则,也即研究工具的效度问题。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围绕所要了解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切题的、重要的且完整的问题。比如说,在出台城乡最低保障资格时,既需要考虑到家庭户的生计能力,也要考虑到家庭户的消费和特殊固定开支项,收入和消费之间要表现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合理性来。如果调查团队遗漏了基层民众关于低保资格公平性的集体观念中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维度,那么整个调查研究的理论效度就是有缺失的。一份完整的调研提纲,是效度的最佳保证。

其次,是测量的稳定性原则,也即信息采集中的信度问题。它指的是在两个不同的时点,调查对象对于研究者所提出的有效问题,给出相对一致回答的可能性。比如说,头一天调查对象告诉研究者的收入情况,和第二天研究者入户访时看到的家庭物质条件总体能对得上,我们就说这一收入报告是相对可信的。信度出现问题,往往是因为调查对象和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秩序出了问题。比如在收集基层意见时,调查对象可能因为担心打击报复或者考虑面子问题,给出具有误导性的回答。此外,不恰当的执行程序,如委托第三方发放问卷因而缺乏面对面问卷填写时受访员在场的社会压力,也会造成调查对象给出不可靠的回答。针对每一种信度问题,都有专门的方法加以处理。

第三项原则,是异质性-多样性原则,涉及质性研究中调查对象所提供信息的饱和度和问题。调研者在调查对象身上,能否相对完整地抓到这一类人群从事某项社会实践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关系到调研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情。比如说,在调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观念的育龄妇女态度的多样性有相对充分的了解。研究

团队往往会事先设置一个数字,当连续有超过该数字的新增个案不再提供任何新信息时,研究就自然停止了。在质性研究中,寻求对每一个亚类或特殊样本的全面了解,是全面完整了解某一类现象或事实的重要程序保证。

第四项原则,是量化研究中的样本代表性原则。依据主要控制变量,样本的属性结构和总体的属性结构应该具有一致性。比如说,当代大学招生中,女性入学率超过男性入学率,因此,当调研者对高校学生展开定量研究时,样本中女生数量也应超过男生,其性别比例应该与高校学生总体性别比例相近。这也是非概率抽样中的配额样本的主要生产原则。在对研究结果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多个结构性因素上,样本应该表现出和总体相类似的分布。

从直觉出发,有人认为网络空间的舆论风向直接代表了真实民意,有关部门还需倍加重视。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网络舆论易被操纵、不足为信,有关部门无须太过在意。遵循前文所述的四个原则,我们可以对当前网上舆论和真实民意的相关程度作出一定判断。

首先,我们要对围绕某个社会议题的网络讨论应该涉及哪些内容作判断。因为内容维度的缺损,会造成明显的效度问题。比如说,在评估公众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时,可以有一系列的指标,包括普通民众关于未来消费的时间安排和规划、规模以上企业采购经理的信心指数预测、大

样本微信签名档的情绪积极性-消极性指数等。业务单位应该在长期工作中,积累起关于上述指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信心指针的经验,可信度的相对排序,并且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地采集高可信度指标的趋势变化,从而更准确地预测由网络舆论所表征的经济社会发展信心指数。

其次,由于网络舆论脱离了真实人际社会互动的伦理压力,某种程度上会有更多虚假表达、夸张描述的可能性。因此,在处理网络舆论时,其可信度和稳定性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在缺乏外部环境刺激因素的时候,特定范围内的舆论应该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对此,调研者要对特定人群网络舆论的可信度和稳定性进行历史标记,从而在判断网络舆论可信度时,有相对系统的历史值作为参考。

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是存在年龄和社会阶层偏误的,年龄偏大的人,互联网使用技术和意愿往往更低,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出于时间机会成本或自我地位意识的原因,也较少积极参加网络舆论表达。因此,部分人群的意愿在网上可能会表达不足。此外,理性公民日益远离喧嚣的互联网舆论场,网络舆论领袖的政治和商业操作过多,也会导致网络舆论和真实民意之间的差距变大。这时,有关部门想透过网络了解民意,可能需要调研者引入专业民意调查团队,建立更加均衡且与网民总体特征更为接近的网民样本,解决网络民意的失真问题。

□ 李双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强调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当下,为何要强调大兴调查研究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尝试着回答:“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没有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心梳理就会发现,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始终坚持和强调的。

1917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描述了他对人力车夫的调查研究情况:“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是在是矣。李大钊认为人力车夫的问题不仅是个人或国民经济的问题,更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先进的思想来启迪人们,需要先进的政党领导人民推翻旧社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成立,就是建立在党的创始人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的。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200多天,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调查研究。针对社会上对组织开展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的表扬还是“糟得很”的批评,他都认真调查。对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问题”,解决得好的和坏的情况都去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准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调查研究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工作方法。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他说:“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并在实践中逐渐跑透了浙江的省情市情县情。正是因为有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有了充足的调

查研究,才有了“八八战略”的重大部署,才有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

调查研究是我们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做了湖南农村调查、江西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耳熟能详的调查研究。围绕调查研究,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论断,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凡是没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等等。

正如此次《工作方案》指出的,“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绕不开、躲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例如,要推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大问题,就离不开扎实的调查研究。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目标已经被提上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怎样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共同富裕带来的获得感?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共同富裕的实现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共同富裕如何体现到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之中?

再如,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当下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难点在哪里?如何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哪些方面是亟须从制度方面进行系统改善的?

可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蕴藏在社会现实中,呈现在与老百姓推心置腹的交流里。只有求真务实,用心发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对问题更为真实的体认,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如何避免调查研究成为新的形式主义

□ 唐郭森(国家部委机关干部)

近日,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为确保《方案》落到实处,保障调查研究的重要功能得以实现,有必要认真思考,针对调查研究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进行探讨。

长期实践证明,调查研究并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办好的。如果只求热闹,只抓表面,只图“交稿”,调研就容易流于形式主义,影响调研工作效果,甚至掺假带虚,造成新的问题。调查研究是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还是沦为办公室里雕啄赏玩的精致八股,关键在于调查研究能否务实、见效,能否在开展中有效破除形式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力部署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持续纠治形式主义的老问题、新表现,体现出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深刻洞见。客观来说,不止调查研究,形式主义风险在各项工作中都可能滋生且广泛存在。长远来看,在科层体制之下,形式主义不是孤立的问题,而往往是与唯上主义、交卷思想、形式考察等弊病伴生的。

要避免这些问题,调研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首先要端正认识,坚持系统观念,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思考和谋划。

在客观方面,要着眼撬动结构性问题,从根源上优化调整考察机制,推动上级考

察重心从结果验收向过程监管转移,从报告材料向脚踏实地转变,从调研本身向指导实践转轨,以此倒逼调研工作注重过程、贴合实际,为摆脱形式主义条框、务实开展调研创造有利条件。要创新制度机制,强化科学引导,如提倡“四不两直”的工作法,针对过去调研中多易发的“四风”问题加强监督,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以及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在主观方面,调研主体要清醒认识到,调研工作本质上是一项实践工作,而不是文稿工作,实践性是调研的本质属性。要深刻领会调查研究的整体性,认识到调查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指导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单独事项。从出发点上,不能为调研而调研,而要带着问题开展调研,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查找问题,有的放矢、精准用力,把握合理限度,避免给基层干部群众添负担,在落脚点上,要科学选取调研点,接地气、察实情,促使调研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

指向实践的调研,才可能是务实的调研。唯有避免停留于理论研究,空对空,避免调研脱离实践“两张皮”,才能有效防调研研究成为新的形式主义。在工作过程中,量脚步而不是看字数,抓问题而不是显功劳,抓后续成效而不是单纯搞事了,才是调查研究做到务实见效的前提基础。

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研的实效、成果的运用,看能否把问题解决好。在注重调研整体性、实践性的务实基础上,还要不断推动见效。唯有从理论高度落到“接地气”的实处,使基于调查的理论研究切实为业务工作赋能,调研工作才算真正落地,完成从前因到后果的工作闭环,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充分发挥调查研究工作的价值。

